学習時報

STUDY TIMES

2016年2月15日 周一/四出版 | 第854期 | 中共中央党校主管主办 网址: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37 代号:1-267

重要言论

从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看，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不少领导干部不仅在前台大搞权钱交易，还纵容家属在幕后收钱敛财，子女等也利用父母影响经商谋利、大发不义之财。有的将自己从政多年积累的“人脉”和“面子”，用在为子女非法牟利上，其危害不可低估。古人说:“将教天下，必定其家，必正其身。”“莫用三爷，废职亡家。”“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与儿孙。”

在培育良好家风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操这点心，家里那点事有时不经意可能就溜过去了，要留留神，防微杜渐，不要护犊子。干部子弟也要遵纪守法，不要以为是干部子弟就谁都奈何不了了。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处理，而且要从严处理。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国务院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永富答本报记者问

高层访谈

□ 本报记者 闫书华 范 伟

记者：刘主任您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指出：“中国的减贫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作出了贡献，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学习经验。”请您简要给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扶贫开发方面取得的进展。

刘永富：好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带领中国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1982年“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宁夏的西海固）农业建设，拉开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此后，又先后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贫困地区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减少农村贫困人口7亿多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为国际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这个成就足以载入人类社会发展史册，也足以向世界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哪些新的成就？

刘永富：根据扶贫开发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党中央、国务院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和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新方略，制定了一系列力度大、针对性强的重大举措，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扶贫开发事业取得新的显著成就。

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2年到2014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5000多万，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1.8个百分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增幅，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预计2015年再减少1000万以上贫困人口的任务可以完成。这将标志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的中期目标和“十二五”扶贫工作圆满收官。

基础设施明显改善。贫困地区水电路建设全面提速，7852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和354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得到解决，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新建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124万公里，综合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地区告别了不通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的历史。

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持续提高。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明显改观，营养改善计划每年惠及3200多万学生，中职学生全部免除学费，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逐年扩大。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应急救助相衔接的机制初步建立。农村低保和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免费就业服务全面实施。

扶贫机制创新迈出重大步伐。完成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为开展精准扶贫奠定了基础。干部驻村帮扶覆盖所有贫困村。以减贫成效为导向的财政资金分配、贫困县政绩考核等机制基本建立。国家设立扶贫日，社会扶贫激励政策日趋完善，各方面参与的大扶贫格局初步形成。这些探索实践，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内涵，进一步增强了扶贫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记者：扶贫开发工作的新进展，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是密不可分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曾谈到，“40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对此您一定深有体会吧？

刘永富：的确，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多次到贫困地区调研指导，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进一步动员和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仅过去的一年里，习近平总书记就多次到贫困地区视察调研。在云南，总书记深入民族地区了解扶贫工作，提出确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不让一个民族地区落伍的要求。在延安，召开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强调加快老区发展步伐，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在贵州，亲自带领7个省区市的党委书记深入贫困村贫困户搞调研，并召开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座谈会，提出“四个切实”“六个精准”“四个一批”，发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之后，又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题研究扶贫开发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习近平主席还在联合国发展峰会、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表重要讲话，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带领人民战胜贫困的坚定信心和坚强决心。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再次郑重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13亿人要携手前进。让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是我心中的牵挂。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板，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

记者：2016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今后五年，要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在您看来，要达到上述目标，主要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刘永富：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县摘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全面小康是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如果到2020年，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还有区域性整体贫困现象存在，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采用常规的思路和办法、按部就班难以完成任务，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因势利导、众志成城确保“十三五”时期打赢脱贫攻坚战。

时间紧迫。从现在开始，到2020年只剩下5年时间。平均每年需要脱贫1000多万人，平均每月需脱贫100多万人。如期兑现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向全世界作出的庄严宣告，开弓没有回头箭。

任务艰巨。从人口规模上看，目前，全国尚有6000万人口没有脱贫，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规模。从区域分布上看，剩下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6省区，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贫困人口最为集中。这些地区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水平低，制约脱贫攻坚工作的开展。其中还有不少人居住在不具备生产生活条件的石漠化等生态脆弱地区，即使花很大代价帮助脱贫，也是暂时脱贫，很快会返贫，必须花巨大代价进行易地扶贫搬迁。从扶贫对象上看，经过多年扶贫开发，条件相对较好的基本都已脱贫，剩下的都是很难脱贫的人口，是难啃的“硬骨头”。其中有不少贫困人口或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患重病慢性病，或者文化程度低，脱贫成本高。从国内外经济环境上看，当前，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脱贫攻坚产生拖累作用。

潜力巨大。脱贫攻坚是带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要动力。贫困地区幅员辽阔，14个连片特困地区占国土面积的40%左右，贫困人口数量巨大。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既能新增有效投资需求，也有助于消化过剩产能、增加就业机会，而且不会造成重复建设。贫困人口消费水平低，但消费边际倾向高，消费层次与我国现有产品档次和产业水平吻合。促进他们增加收入，可以扩大有效消费需求，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赢得时间和空间。贫困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促进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对经济发展大局可以起到“下好一子、带活全局”的效果。

记者：针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要打赢脱贫攻坚战，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思路是什么？

刘永富：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后不久，中央紧接着就召开了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十三五”期间的脱贫攻坚工作作出新的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党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民族发展的历史高度，深刻分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发出了动员令。李克强总理从贫困地区不断增长的有效投资需求、资源要素供给、消费需求带来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空间，深刻阐述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对基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意义，对“十三五”时期脱贫攻坚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

十八届五中全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对“十三五”脱贫攻坚的部署，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一个目标，两个确保，六个精准，五个一批，解决好四个问题。一个目标就是补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两个确保就是确保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摘帽。六个精准就是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就是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教育培训脱贫一批、生态保护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四个问题就是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

记者：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即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您能给我们谈谈《决定》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吗？

刘永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规定了“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重大举措，吹响了总攻贫困的号角。《决定》的突出内容，是提出了“四个明确”的要求。

目标明确。《决定》提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途径明确。《决定》明确，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提出了十条要求：健全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发展特色产业脱贫、引导劳务输出脱贫、实施易地搬迁脱贫、结合生态保护脱贫、着力加强教育脱贫、开展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脱贫、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兜底脱贫、探索资产收益扶贫、健全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

（下转5版）

时势专论

促进“新四化”同步发展

□ 本报评论员 熊若愚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明确要求。这个要求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多年来，我国信息化发展迅猛，一些领域已居于世界前列；工业化发展迅速，显著快于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由此导致了城镇常住人口比城镇户籍人口多出2.6亿，在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结构”，城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出现一系列不协调、不平衡问题。破解这些难题，关键在于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促进“新四化”同步发展。

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具有客观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和发展，成就了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是，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自2012年到达峰值后开始逐年下降，一些地区和行业出现劳动力供给不足现象。与此同时，工资成本持续上涨，带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优势逐步下降，出口竞争力弱化，钢铁等行业产能出现严重过剩，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的新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为“新四化”同步发展提供了内在要求和重要契机。要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必须用信息化提升工业化质量，推进城镇化以扩大内需，通过农业现代化解决大量农民进城后的农产品安全保障问题，从而实现“新四化”同步发展。

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经过这些年奋力追赶，我国在信息化上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是很大，一批互联网和通信设备制造企业进入国际第一阵营，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前10强中，中国企业占4家。信息化的迅猛发展为通过“互联网+”来推动工业转型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促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必须推动网络长期演进和技术升级，加快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构建新一代国家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提升现代信息技术产业支撑能力；适应当前全球科技创新交叉集成、跨界融合、集群突破新趋势，加快构建面向制造业重大共性需求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以抢占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主导权为核心目标，加快提升制造业产品、装备及生产、管理、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充分发挥我国互联网先发优势，在工业领域加快实施“互联网+”先进制造行动计划，培育基于互联网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

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协调。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受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我国城镇化水平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形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态。常住城镇的外来人口长期不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使得城镇化和工业化带来的集聚效应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还在城乡接合部聚集大量外来人口，安全管理难以到位，不稳定因素较多。促进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互协调，必须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构建创新转型的大平台，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做大做强服务业，推进产业融合，增强创业活力，充分发挥服务业在促进就业方面的作用；注重人的城镇化和现代化，实现城乡人口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平衡发展。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新四化”同步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流通方式组织农业生产，包括使用农业机器设备、发展专业化分工，等等。随着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的生活方式也会逐步走向城镇化和现代化。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平衡发展，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深化农村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从而维护农民权益、优化城乡资源配置、降低城镇化成本；用工业的思维来发展农业，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确保粮食安全和工业原材料供给；通过推动户籍人口城镇化进一步吸纳农村人口，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和文明程度。

“降成本”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观察员

□ 陈江生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自身发展的高度前所未有，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前所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近临门一脚之时。但是，行百里者半九十，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结构性改革任务十分繁重，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为什么“降成本”如此重要？我们又如何去完成好“降成本”的任务？

中国过去六十多年之所以能够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每个大的阶段都成功地实现了社会经济发展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第一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虽然这个大市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一个“被计划”了的大市场，但是中国大陆的真正统一，匪患的消除，政治的清明，使得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要素的流通第一次消除了源于割据、源于社会动荡、源于明目张胆的腐败的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再一次全面降低了社会经济运行成本。虽然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至今仍存在着许多“硬骨头”，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消减了计划经济带来的、转轨过程中新生的一系列“交易成本”。两个阶段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下降，对应了中国发展的两次飞跃，第一阶段中国从一穷二白到建立起了虽然比之先进水平有些落后，但却是世界大经济体中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第二阶段使得中国进入了实现全面小康的决胜期，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之外，到了今天的世界第二。可见，社会经济运行成本的降低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在新常态下，我们要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新的飞跃，同样必须谋求降低社会经济运行成本。实现这一目标的办法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整个社会运行的、实体经济企业的成本下降。

第一是推进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经济中存在太多的审批、太多环节、太多的政府干预，出现了成立一家公司要盖39个章，盖一栋楼要交95种税费、盖192个章等问题，甚至出现了被要求证明“你妈是你妈”的笑话。显然，这些问题已经极大地限制了企业效率的提高，限制了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活跃程度，从而成了当前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要解决这些问题，只能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来实现。

第二是通过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降低电力价格、降低物流成本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首先是降低税费。税费的目的实质是从社会经济中拿出一部分资源来用于维护社会经济运行，其目的是要让社会经济运行更加顺畅。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收费有些是不合理的，既未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还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这就需要通过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实现放水养鱼，实现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其次是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关键是规范虚拟经济，减少融资的中间环节，建立有序竞争的金融竞争市场，通过这个竞争市场真正提高资本效率，使实体经济得利。再次是降低物流成本。许多国内生产的产品，其国内的售价却远高于国外售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流通的复杂程度超过了国际流通，国内流通成本高过了国际流通成本。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就必须把减少关卡、通畅物流，简化国内流通、降低流通费用的事情做好。

无疑，中国经济的第三次飞跃正在眼前，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系列“降成本”的办法、规则、制度正在形成。中国企业、中国实体经济、中国经济的更强大竞争力正在形成。